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TUDIES ABROAD: A COLLECTION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

上海辞书出版社

Chinese Studies in USA from Chinese Perspective

中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



朱政惠◎编

※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系列研究

中国学者 论美国中国学

Chinese Studies in USA from

Chinese Perspective

◎ 朱政惠 编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朱政惠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12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朱政惠主编)
ISBN 978 - 7 - 5326 - 2525 - 3

I. 中… II. 朱… III. 汉学—研究—美国 IV. 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1343 号

责任编辑 吴一新
特约编审 任余白
装帧设计 汪溪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 中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27.75 插页 1 字数 468 000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2525 - 3/K · 830

定价: 5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55032807

“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序

目前,国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正积极开展起来,如何使对它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并跨入真正的学科建设,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认为,对国际汉学的研究,“应当采用学术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将汉学的递嬗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考察”,“和其他种种学科一样,汉学也受着各时代思潮的推动、制约,不了解这些思潮的性质及其产生的社会原因,便无法充分认识汉学不同流派的特点和意义”(《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序,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这一学术主张得到很多学者的认同。

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起步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当时开始这一研究,主要是为了深入对中国近代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而这些不同于中国传统史学的近现代史学流派,都受到海外史学思想和史学思潮的很大影响,因此必须从史学的国际交流及其互动的视角去观察和认识。在此过程中,比较文学、接受美学等理论探讨的兴起,曾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使我们对本土史学的研究延伸到对海外中国史学的比较研究,并拓展到对海外汉学、海外中国学发展的探讨。在此研究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学科基础和方法论的重要指导作用。根据其学科理论和基本方法,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对象就是海外的中国学家、中国学著作、中国学机构,以及与其相关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编纂理念,通过对其历史原貌及其学术流变的考察,探究其学术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总结出有益于我们学科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以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十分重视与对象国历史及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联系考察,注意对象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及重大国际事件的联系考察,关心国际学术思潮与对象国学术思潮的互动关系等。所以从这点上说,我们很赞同李学勤教授的意见,只有这样,才能深入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学术史、思想史、史学史,其研究取向与研究

方法有很大的相通性。

海外中国学包容宽泛的特点,决定了任何一个学科不能单独穷尽其研究,所以对它的探讨,必须有历史学、文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政治学、伦理学等众多学科的联合攻关。如果每个学科都能根据自己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深入对其相关领域的探讨,那么,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就有可能在整体上获得重要突破。

我们之所以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介入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不只是因为我们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时间较长,一个很主要原因,还在于很多国家的汉学、中国学缘起及其主要成就,都相对集中于对中国历史等人文问题的探讨。在美国,无论是20世纪上半叶的汉学还是“二战”后的现代中国学形成,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一直比较集中于历史及传统文化的探讨,尔后社会科学逐步介入,转入跨学科、多学科的发展态势。所以从历史学突破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是一种对客观历史过程的尊重,也是针对性开展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必要手段。诚然,由于越来越多的学科介入中国问题的探讨,所以对研究者来说,仅仅从一个学科来把握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是不够的,只有跨学科的视野和多学科的渊博学识才有可能应对变得越来越复杂的研究局势和研究对象。

中国的崛起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兴盛,使这一探索工作更具魅力而富有意义,这也是我们始料不及的。但总的说,这项工作还属于起步的阶段。目前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翻译丛书已有不少,各家都有自己的用心和重点。参考诸家丛书发展特色,本丛书将把重点放在对海外中国学发展史的探讨上,包括对象国汉学史、中国学发展史的梳理、回顾和总结,一些重要汉学家、中国学家、中国学机构成就的探析和解读;当然,为了了解当前国际汉学发展前沿与思潮动态,也将重点翻译和推出一些重要汉学家、中国学家的学术名著,包括国内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相关重要学术成果。为后人留存史料、保持珍贵历史记忆以及对学术前沿的探索,将是我们这套丛书的重要使命,为此,我们还将努力推出一些自己的原创性成果。研究和批判人家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本民族文化的建设和繁荣。

三十年改革开放重新点燃了中国学者对海外汉学、中国学研究的不熄热情,衷心期望我们的努力成为通往成功之径的小小铺路石。

编者
2008年3月

前　　言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中国学研究基地之一,很多问题的探讨处于世界中国学的前沿,所以对它的研究是了解这个国家中国学的需要,也是深入世界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路径。开展对美国中国学的研究以后,我们一直以为,编纂一本美国学者对于自己国家中国学发展情况反思和回顾性质的论文集是必要的,这对于我们了解其中国学发展大势是必要的,也是我们进行这方面教学和研究的基本参考资料。同时,我们觉得也需要编一本中国学者对美国中国学研究和探讨的论文集,集中一些这方面的成果,与美国学者论中国学的文献共相发明。所以这本《中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是作为《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的辅篇出现的,主要收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者对美国中国学研究情况的相关论文。

中国学者对美国中国学的关注比较早,20世纪初以来,就陆续有一些杂志介绍过美国中国学的发展情况^[1]。中国的一些学者还远赴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和美国学者一道,共同进行美国中国学的建设。但这一进程,1949年以后有所中断,国际冷战局面和中美关系的对峙,使这一关注和研究停顿了几十年,一直到中美建交。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对美国中国学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不仅完成了像《美国中国学手册》这样的大型工具书的编纂,一批学术杂志也做了积极探索,还有大量中国学研究专著翻译面世。国内相继出版的中国学研究

[1] 如《最近美国对于中国史研究一瞥》(《史学杂志》第1卷第6期,1929年12月)、《最近十年关于中国英美俄德文献》(《新生命》第2卷第12号,1929年12月)、《美国大学竟设汉学讲座》(《申报》1928年4月5日,第11版)、《欧美研究中国学术之杂志》(《行健月刊》第6卷第4期,1935年4月)、《欧美人士研究中国边疆问题之书目》(《边疆》第1卷第1至5期,1936年8月至10月)、《欧美汉学研究之文献目录》(《史学消息》第一卷第四期,1937年3月1日)、《美国各大学汉学研究近况》(《图书季刊》新2卷第4期,1940年12月)、《美国七十六院校设中国文化课程》(《申报》1948年3月20日,第6版)等。

集刊及成立的研究机构,促进了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发展。由此开始,一些学者深入到对其发展历史、学术思潮、中国观演变、重要学术观点、重要代表人物及其研究方法的探讨。

在这些探讨的深入过程中,中国学者十分注意方法论的把握。李学勤等学者提出用学术史的方法探讨海外汉学、中国学发展史。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将汉学的递嬗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考察。汉学受时代思潮推动、制约的特点,决定了了解这些思潮的性质及其产生的社会原因十分重要,否则无法充分认识汉学不同流派的特点和意义。学者们认为,对美国中国学的研究,确实要注意学术史研究问题:注意把对美国中国学的探讨,放在当时特定的国际背景、学术背景、中美关系以及两国各自的国情、语境条件和学术谱系下考察;要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以美国为背景,对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作出科学、准确的判断。

为了做好这些工作,中国学者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一方面,邀请美国优秀的汉学家、中国学家来华访问,介绍他们的发展情况和研究动态,参加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一方面,自己走出去,走进他们的图书馆、研究室、课堂、档案馆,深入了解其中国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和即时动态。通过这些年的努力,中国学者的研究也颇有成效,显示出对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一定深度和高度,试图对他们的研究有比较客观、接近实际情势的描述。

关于“汉学”、“中国学”,迄今还是有不同的理解。我们认为,大体可以说,“汉学”主要指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总体研究,“中国学”则更宽泛,指海外学者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社会等诸方面问题的研究,或者说就是当代中国问题研究。就美国而言,一开始所开展的中国问题研究,主要由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担任,关注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也比较讲究现实问题的探讨;尔后,由于欧洲汉学家的介入,一度走向严谨的汉学发展阶段;不过,“二战”以后,由于远东和中国战略地位的凸显,现代中国学又演变为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主流趋势。到上世纪 60 年代,社会科学介入中国问题研究更成为美国中国学的重要走向^[1]。我们的研

[1] 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学者曾就社会科学介入中国学的问题展开讨论,美国亚洲协会组织了这一探讨,史华慈、列文森、芮玛丽、施坚雅、牟复礼、崔瑞德、墨菲、萧公权等一批重要汉学家参加了讨论。美国《亚洲研究杂志》1964 年第 23—24 卷对此讨论发言作了连载。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组织了对此文献的翻译,刊登于《海外中国学评论》第 2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

究,总体上讲,属于对“中国学”的研究,因而也需要跨学科的视野和跨学科的方法。这里所收集的论文,相当部分是社会科学的探讨。不过从美国现代中国学形成的历史和过程看,历史学研究始终是其中的重要领域,所以我们对它们的研究,又特别注意中国历史问题的探讨,因而所选的相当一部分论文属于这方面。即使这样,它们的历史研究也是社会科学化的,此起彼伏、令人目不暇接的各类模式的探讨就是明证。

对于美国中国学发展史,美国学者都有过一些重要总结和探讨,赖得烈(Kenneth S. Latourette)、傅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卡梅伦(Meribeth E. Cameron)、费正清等学者的论文,至今是我们这方面研究的重要参考。中国学者也在这方面作了努力探索,试图描述出其中国学发展的演变史,阐释其重要的历史阶段及其重要学案,以及相关学术思潮的演变等。中国学者的探讨,还重视其发展过程中中国历史观和中国观的演变,柯文对“冲击—反应”论的批评和对“中国中心观”的阐述,曾经是中国学者密集关注的目标;同样,中国学者也关心其中国学研究过程中模式演变特点的探讨,注意其研究中值得中国学者深入关注和批判取鉴的地方。美国学者对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探讨,在各个学术领域展开,中国学者的追踪探讨也铺散到相关领域,如社会史、地方史、史学史等。西方学者对中国学术的研究和中国学者对这些研究的反研究,总的说是不平衡的,中国学者需要大力追赶,没有深入实地的考察和具体而微的即时了解,很多研究根本不可能开展。这里所收集的论文,至少说明,凡是他们有过的研究,中国学者能做到一定的追踪研究,虽然还有许多重要的新思潮和新特点没能反映出来。

对美国中国学发展史的研究不是抽象的,是落实在每一个具体学者身上的,是通过对各个阶段代表人物的研究实现的。只有对这些带有时代特征的学者的研究一一深入了,整个发展史的眉目和学术谱系才会清晰。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的学者都知道,卫三畏是美国中国学的重要开山者,他奠定了美国中国学的初基;劳费这一代非美国裔汉学家的出现,是美国中国学发展中的重要过渡,有力促进了初创时期美国中国学的发展;费正清、史华慈等学者是“二战”后伴随现代中国学发展的第一代重要领军者,留下了几乎所有现代中国学家难以忘怀的足迹和印记;魏斐德、孔飞力、史景迁“三驾马车”,成为当前美国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轴心和领袖,引领一代学术发展方向;裴宜理等学者被称为第三代中国学研究的中坚和骨干,是当前美国中国学领域里活跃的前沿人物。通过近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学术工作者对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正在积累。一个以美国中国学重要学者研究

为线索的美国中国学发展史框架也逐渐显现出来。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收集的论文,是以我们所追踪的目标为线索排列的。文集的上卷是关于美国中国学发展史的探索,下卷是关于美国中国学史上重要学者的研究。然而所收入的文章,却发表于各个年代。以今天的标准看八九十年代初刊行的论文,也许会觉得有些介绍和分析或显简略,但正是这些文章,反映了当时真实的历史情况。在当时的学术积累、信息和资料条件下,学者们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属于当时前沿性质的思考和研究。基于这一原因,我们没有对这些文章作任何修改,而保持它的历史原状。这也是我们需要保留的历史足迹和历史记忆。诚然,文章选择上会有挂一漏万的问题,一些重要而有见地的文章尚未收入,多少有点遗憾,但这一定能得到妥善解决,将来有机会做续集时,会积累更多这方面的探讨成果。

改革开放之初,学术界很重视对外的开放和学习,强调多看看外面的世界,呼吸新鲜空气,改变沉闷已久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氛围,拓宽和深化关于中国自身的知识。但很快,学术工作者觉得也要防止另一种倾向,逢事就称“外国月亮圆”——所谓新的“拿来主义”。这种现象,国外学者也觉察到了,一些学者曾告诫:中国学者在洋风西潮面前,千万不能亦步亦趋,忘了自己的本,一定要“守住自己的根”“如果不注意这一问题,以后可能无法与国际学术界对话”。^[1]这是他们对中国学者的忠告,也是我们这本文集编选过程中十分注意的问题。我们研究人家,归根结底是为了本民族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美国是现在世界上中国学研究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无论研究机构、专家队伍、学术成果、研究生培养、资金投入,都屈指可数。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和兴盛,其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会有更大推进。所以我们对美国中国学的研究,有其重要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近三十年来中国学者对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成果,与此前相比,确实天差地别,突破相当大,但与研究对象的丰硕成果相比,差距还是存在的。所以严格意义上,对美国中国学的研究,还只刚刚起步。

衷心感谢本文论集中的作者对我们收集整理工作的支持,感谢上海辞书出版社各部门领导的关心和责任编辑吴一新女士的艰辛努力。感谢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历史系领导和同事的关心和支持,感谢我们团队同事和研究

[1] 加拿大学者卜正民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10月29—31日)上就提出这样的问题。

前　　言

生的协心努力。

衷心期待这一文集能促进我们对美国中国学的研究，也希望有更多更好的研究论文的出现，共同深入对此问题的探讨。

2008年5月于沪上明日新苑

目 录

前言 (1)

卷 上

美中贸易与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奠基

(殖民时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 张 锐 (3)

美国中国史研究专业队伍的形成及其史学成就

(第一次世界大战至第二次世界大战) 张 锐 (14)

战后美国对中国的研究 李世洞 (28)

美国现代中国学的批判思潮与“中国中心观” 侯且岸 (41)

从“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观”

——当代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张 锐 (64)

国际学术思潮与美国的中国史研究 张 锐 (78)

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 杨念群 (92)

近年来西方汉学清史研究若干范式 何 平 (111)

近三十年来美国的中国地方史研究 陈君静 (132)

对美国学者近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回顾 定宜庄 (143)

美国清史资料及其研究述略

——以历史学研究为主线的考察 朱政惠 (149)

20世纪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的若干问题 朱政惠 (167)

当代中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周晓虹 (186)

卷 下

卫三畏与美国汉学的起源 张宏生 (203)

中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中国观	刘天路	(223)
劳费汉学研究述评	龚咏梅	(236)
拉铁摩尔和他的中国问题研究	陈君静	(252)
费正清与美国的中国学	陶文钊	(263)
史华慈的中国学研究	朱政惠	(280)
莫扎特式的历史学家 ——论列文森的中国学研究	杨 华	(296)
施坚雅模式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任 放	(323)
魏斐德的中国学	叶 斌	(346)
孔飞力清史研究述略	龚咏梅	(360)
史景迁的史学内涵和意义	朱政惠	(384)
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	陈君静	(402)
裴宜理教授的中国学研究	朱政惠	(413)

卷 上

美中贸易与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奠基 (殖民时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

张 锐*

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始于美利坚民族的形成时期并随着美中贸易的加强而获得发展的动力。由于在那一时代美中贸易对美国社会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因此引起美国人对东方问题的浓厚兴趣。美国东方学会成立于 1842 年，而美国历史协会成立于 1884 年，就是有力的证明。本文将介绍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是如何伴随美中贸易的发展而奠定基础的。

一 美中贸易的早期发展及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

早在美国历史上的殖民时期，北美十三州的人民对遥远的东方帝国——中国已有所感知。英国人饮用中国茶的习惯，18 世纪初已传入北美殖民地，到 1781 年一般家庭已每日两餐均要饮茶。与饮茶习惯相伴随，中国瓷器也开始输入了十三州。茶与瓷器很快成为大宗赢利的商品。

然而根据英国 1651 年颁发的“航海条例”以及其后的有关立法，北美殖民地的商人不能用自己的船只到中国直接采购商品，而只能在伦敦市场上购买中国的茶叶和瓷器，这表明北美十三州的商业利益控制在英国殖民者的手中。

为了打破英国对东方商品的垄断，北美十三州的商人开始到荷属西印度的圣埃乌斯塔希亚岛(St. Eustacia)购买中国的茶叶和瓷器，然后运抵新泽西州再渗入

* 作者张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发表于《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 年第 5 期。

到内陆各地。于是走私贸易兴起,而且规模越演越烈,至 18 世纪 50 年代达到高峰。宾夕法尼亚州在 1757 年合法地从英国进口的茶叶为 16 箱,而事实上每年消费的茶叶在 200 箱,可见走私贸易的规模。^[1]

在上述历史时期,北美殖民地的报刊上每每登载出售中国茶叶和瓷器的广告,而且茶叶和瓷器已成为拍卖行和市场上引人注目的成交商品,瓷器也已列入私人财产的清单以及遗嘱中,中国的名字逐步为美国人所熟知。

围绕中国茶叶和瓷器的进口,北美十三州与英国殖民当局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终至酿成“波士顿倾茶事件”,由此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争取与中国直接贸易的权利和愿望与北美人民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紧密相关,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已具有一种象征意义。

美国独立以后,为了突破英国的经济封锁和打开与东方贸易的通道,1784 年 2 月 22 日“中国皇后”号商船前往中国并于次年 5 月返回美国。这是中国与美国的初次接触,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美国。当时美国的报刊上曾做如下评述:“当该船满载而归,其中那么多商品是我们原本要从欧洲进口的。此举预示着这样一个欣慰的时代:我们终于能从对我们这个新生帝国充满歧视、有如重负的贸易(指与英国的贸易——引者)中解脱出来。”^[2]美中贸易增强了美国独立发展的信心。

“中国皇后”号首航 25% 的利润,刺激了越来越多的美国商人前往中国贸易。1784—1804 年间,每年前往中国的商船约 22 艘;1804—1846 年间,每年前往中国的商船大约在 30 或 40 艘之间。美中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3]

美国联邦政府对美中贸易通过立法给予特惠,如 1787 年规定,由美国船只经好望角直接运回美国的中国茶叶,予以免税。1791 年起对东方商品开始征税,但对直接从广州进口的中国商品仍予以特惠。发展美中贸易已作为美国的基本国策。

在政府的扶持和保护下,美中贸易迅速发展,中国的茶叶、瓷器、南京布(以及用南京布制成的上衣和裤子)、围巾、纸扇、鞋、壁纸和其他手工艺品不断涌进美国市场并在美国社会中造成广泛的影响:

首先,茶叶和瓷器走进美国千家万户,成为生活的必需品,就其实用程度来

[1] 乔纳森·戈尔茨坦(Jonathan Goldstein):《费城与中国贸易(1682—1846)》(Philadelphia and the Chinese Trade, 1682—1846)。宾夕法尼亚 1978 年版,第 18 页。

[2] 同上书,第 31 页。

[3] 同上书,第 20、34 页。

看，“几乎相当于面包”，“在我们国家，很少有家庭哪怕境遇贫困，会不因缺少这种令人提神的饮料(茶)而不感到极大的不适。种类繁多的茶具(瓷器)幸而质地各不相同，因而尽管进口税很高，还是有一小部分可以为社会上穷困阶层所获得”。〔1〕丝绸在美国社会上层所受到的欢迎这里不再赘言，我们特别想指出的是中国出产的被称作“南京布”的褐黄色棉织品，由于坚实耐用备受美国人喜爱并成为美国人最常用的纺织品。很多美国人以穿南京布料的衣服为荣。〔2〕

其次，中国丝绸、瓷器以及壁纸上的图案、花饰和手工艺品的制作技巧，给美国的艺术家和技工以美学上的启迪。他们开始仿照和复制具有东方风格的绘画和手工艺品。在费城等地还仿照中国的风格，甚至用中国运来的原材料，兴建了一批建筑物。很多美国人深信中国人的技艺超过了西欧人。〔3〕

其三，随着美中贸易的开展，一些美国人开始将部分中国优良的物种引进美国，比如“中国皇后”号带回美国的一种上海公鸡良种经培育，发展成有名的新鸡种(Bucks Country Chicken)；此外美国还引种了中国的水稻、谷物、巢菜(vetch)和黄豆，后者在美国大面积推广并成为重要的出口物。与此同时，美国又在南方进行种茶的试验；1830年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又建议国会在立法形式推动养蚕业的发展，以此为美国的丝织业奠定基础。〔4〕

美国的有识之士认为唯有引进新物种，美国才能最终摆脱对外国的依赖。〔5〕那一时代的美国人是把美中关系与美国的未来利益放在一起考虑的。

其四，美中贸易带动了美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大量美国船只前往东方贸易，刺激了美国造船业的迅速扩展；与中国贸易使费城、波士顿、诺福克、查尔斯顿、萨凡纳、莫比尔和新奥尔良等港口城市日益繁荣；随着中国商品向美国纵深地区销售，美国内陆运输网络也随之延展；在与中国的贸易中，一些美国商人聚积了大量财富，然后将其投资于国内产业部门和金融系统，像吉拉德，他本人拥有18艘从事东方贸易的商船，他将盈利投资于美国第一和第二银行，他又参与了从费城到哥

〔1〕 琼·麦克卢尔·马奇(Jean MacClure Madge)：《对美贸易中的中国外销瓷(1785—1835)》(Chinese Export Porcelain for the American Trade, 1785—1835)，美国特拉华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24页。

〔2〕 乔纳森·戈尔茨坦：《费城与中国贸易(1682—1846)》，第2—3页。

〔3〕 同上书，第37、38页。

〔4〕 同上书，第41、74页。

〔5〕 同上书，第74页。